

展示政治 :以公共文化服务来理解 *

李世敏 吴理财

摘要 :展示政治无处不在 ,然而人们对于这种普遍存在于政治之中的展示现象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甚至还存在诸多误会。通过以公共文化服务为例 ,对遍布公共行为之中的展示政治作一个探索性论述 ,我们认为展示政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形态 ,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视角。展示政治既是展示与政治“互嵌”而形成的一种现实存在 ,同时也是从展示的视角对政治的一种新解读。展示政治可以通过建筑、文本等展示载体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传播一种政治理念、释放一种政治信号 ,从而引导受众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 ,当然受众也会对展示政治进行能动性“解码” ,而不会完全受之操纵 ,因而现实生活中的展示政治也是有限度的。

关键词 展示政治 文化政治 公共文化服务 编码 解码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6)02-0073-07

一、引言

政治离不开展示 ,几乎一切政治行为都意欲向人们展示什么。然而 ,至今人们对展示政治知之甚少 ,尚未进行深入研究 ,以致人们对它存在许多偏见或误解 ,认为政治中的展示存在作秀、“搞形式主义”等情况。国外少有的研究 ,主要是从展览政治延伸出来的 ,但仍然拘泥于文化政治视界。事实上 ,无论是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还是在所谓的现代政治之中 ,展示政治几乎无处不在。“政治通过

象征来表达” ,“权力必须披着象征的外衣才能表现出来” ,^[1]而这种“象征”及其“表达”或“表现”均要透过“展示”。

美国社会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认为 :“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 ,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2]其实不止是在个人的社会生活领域 ,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印象引导和控制 ,并且其与展示密切地“互嵌”在一起 ,形成了“展示政治”。展示政治可以通过建筑、文本等展示载体表达一种政

治姿态、传播一种政治理念、释放一种政治信号，从而引导受众达到预设的政治目的，当然受众也会对展示政治进行能动性“解码”，而不会完全受之操纵，因此，现实生活中的展示政治也是有限度的。

为了方便理解展示政治，本文尝试以公共文化服务为案例^[3]，对遍布公共行为之中的展示政治做一个探索性论述，认为展示政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形态，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视角。

二、文化政治转向中的“展示政治”

文化并非天生就是政治的，只有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当文化进入到一个统治与抗争、规训与启蒙的场域中时，它才成为一种“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4]“文化政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直到20世纪才开始在欧美流行。卢卡奇(Georg Lukács)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角度进行文化政治分析。卢卡奇主要从物化和阶级意识着手展开分析，葛兰西则强调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重视文化上的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为“文化霸权”)。^[5]二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政治理论走上历史舞台，涌现出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许多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相比，阿诺德(Matthew Arnold)等并没有简单地把文化理解为对社会的简单“反映”，他从教化公众、重建秩序的意义阐释文化的重要性。霍克海默所称的“内化的压抑”，即把社会统治更深地内置于被征服者的身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也重视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

表象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策略就是通过将个人包装为一个具有理性意识的主体，从而使个人在一种主体的幻觉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认同。^[6]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将文化政治称为“后阶级政治”(post-classpolitics)，在他看来，政治力量如果要维护其合法性，就必须深入到主体性中去，这就需要造就被“伦理-政治”的责任内化为自发倾向的公民。^[7]

随着人的主体性崛起，当代政治出现了一种文化政治的“转向”。在西方文化政治研究领域有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展示政治”，而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展示政治”又是从“展览政治”中延伸而来的。展示，英文为display，源于拉丁语的名词displico和动词displicare，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展示的概念是对展览(exhibit)概念的扩展和延伸。

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之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对博物馆的分析中引入了“展览政治”的概念，他从解释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与权力框架入手，对博物馆与文化建构、殖民地景观等几个层面展开文化政治分析，认为博物馆占有和展出物品具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和考量，展览物按照现有的话语系统加以结合与组构，并最终得出结论：“展览的政治意味着各博物馆让特定的文化被看见。”^[8]

其他学者在对博物馆的分析中虽然也使用展示政治(politics of display)的概念，然而在具体的论述中也交叉使用展览(exhibit)这个词汇。比如Sharon Macdonald认为，所谓展览就是“对眼睛说”(speak to eyes)。他的展示政治分析理论基础就是把博物馆视为一个公共展示背景或者传播媒介(media)，这个公共展示的媒介中涉及权力的展示，展示中隐含着权力分配。^[9]

在我国台湾地区，王志弘及其研究团队在对文化治理进行研究时注意到了“展示政治”。王志弘对展示政治的界定如下：“目前学界开始从‘展

示政治’(politics of exhibition)的角度来讨论相关议题,亦即任何的展览都是在镶嵌于特定社会历史脉络的制度结构中,根据或明言或隐晦的价值立场,以特殊再现方式(主题和展品的挑选、展场布置和运动安排、文选看板设计,以及引领观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是个会引发各种冲突的文化治理场域。”^[10]从中英文的翻译中可见,与西方学者一样,王志弘也主要是从展览的角度理解展示政治的。

概言之,无论是西方的研究,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艺文展览方面对展示政治进行探讨,研究的视域较为狭窄。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中文语境下展示是对展览的延伸,展示比展览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范围。因此,本文对展示政治的探讨就是在延伸展览的意义上进行的,它是从展示的视角对政治的研究。

三、理解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展示政治”

为了便于理解展示政治,本文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分析案例,主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建筑以及宣传等方面,对展示政治做一个探索性论述。

(一)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的“展示政治”

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主张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政策这个视角也使得文化研究增添了诸多政治色彩。政策可以表达一种姿态,一旦确定下来有利于构成一种情境,未来的一系列决定都将围绕这一情境中作出。^[11]就公共文化服务而言,自从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之后,有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各项政策和方针就层出不穷并不断“体系化”,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性再次升

级。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文化政策分为“政策本身”和“政策展示”两个部分,其中作为“展示的文化政策”的总体目的是美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放大国家形象”。^[12]可以说,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有美化和包装政府形象的考量。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而言,它试图展示出一种“服务型政府”的形象,并努力塑造“政府重视人民群众文化权益”。

公众通过公共服务了解政府,政府也运用公共服务争取公众,公共服务形象是整个政府形象的客观基础。^[13]有学者指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层面上基于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一种总体文化战略……走向全新的服务型公共文化治理模式”^[14]。而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需要基于服务型政府的管理模式,只有在国家处于公共政府的前提下,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才具有讨论意义和建构真实性。^[15]因此,很多文献研究和新闻报道都把公共文化服务视为政府提供给民众的一种文化福利,以此来展现“服务型政府”形象以及表达“政府对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视”。

(二) 公共文化服务建筑中的“展示政治”

从2005年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政策性概念到2015年的10年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无疑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硬件设施的建设与更新,而公共文化建筑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14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44423个,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3686.39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8.8%,全国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269.51平方米,在2006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而随着中央对地方重大公共文化工程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

各地掀起了一股公共文化场馆新建(扩建)的建设热潮。以湖北省为例,2011年至2013年全省县级“两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共安排了58个建设项目,累计投资超过50亿元,建筑面积超过75万平方米。^[16]

在这场公共文化建筑建设热潮之中,不时涌现出一批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文化景观式建筑。这种颇具视觉冲击力的新兴建筑,很快就成为当地的一种标志性建筑,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景观就是一处风景,具有视觉上的观赏性,看了能够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能够自然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具有天然的展示性。

以湖北省图书馆(新馆)为例,这座总投资7.8亿元、占地超过100亩的公共文化建筑,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建设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大型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同样在一些贫困地区也有一些文化地标性建筑产生。比如2012年完工的湖北省恩施州文化中心,占地约10.4万平方米(155.9亩),总投资约8亿元。当地媒体公开报道“恩施州文化中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州投资最大的公益设施项目和‘十二五’重点工程项目,也是恩施州城的文化新地标”。

为什么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中普遍重视硬件,尤其是对建筑情有独钟?吴良镛教授在《世纪之交展望建筑学未来》的主题报告中,认为:“广义的建筑应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17]后现代社会是以视觉表象符号作用于人类认知感官的时代,视觉开始成为当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18]建筑无疑是一种直观的视觉符号,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建筑规模能够轻松地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自然地在人们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展示工具。

通过真实世界和表征世界的结合,建筑中被嵌入了各种信息和理念,而不只是一个物体。^[19]比如公共博物馆,表面上是容纳一种文化展览的建

筑物,然而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工具,“它有助于向现代民主政体的公民传输被表征为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20]。就公共文化建筑的大量涌现而言,它以其直观的形象“诉说”着政府的政绩,并以其公共性质展示着“服务型政府”形象。

(三)公共文化服务宣传中的“展示政治”

展示追求的目的是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使展示对象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媒体的宣传和传播恰恰具有“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21],因此宣传和传播也是展示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方式和渠道。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创建的本义就是要打造“典型示范性意义”,因此对宣传工作格外重视。2011年6月3日《关于开展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宣传工作的函》中明确规定,要对示范区(项目)进行“统一、集中和有序的宣传”,并且对一些具体的宣传内容作出了明确安排:在文化部机关报和创建工作指定宣传平台《中国文化报》开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和“公共文化论坛”专栏;组织示范区创建成果展览展示活动;组织重量级媒体对创建活动进行集中的宣传,尤其是在示范区创建的重要节点,组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重要媒体进行深入报道宣传。此外,每个创建单位都需要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并确定一名信息员专门负责宣传和信息报送,其中中央媒体的宣传工作统一由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设计办公室协调安排。^[22]

2011年11月18日,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了《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过程管理几项规定》(暂行)的通知,第六条明确规定“建立信息宣传工作评分制度”,并且指出:“在创建周期内信息宣传得分情况将作为对创建示范区和示范项目进行验收的重要内容,占验收测评总分值的一定比重。”(参见表1)为了强化过程管理

的相关要求,该文件对过程管理没有达到基本要求的创建示范区和示范项目,“验收时将实行一票否决”。

《加快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意见》中也提出要“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现代传播能力”。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宣传实际而言,目前主要以亮点呈现和展示为主,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对典型成功案例的宣传青睐,对大型、群体性活动的宣传偏好,对体制机制创新的宣传倾向,以及对标准化等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的宣传热衷,等等。一言以蔽之,所有的宣传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对成绩和亮点的展示。

(四) 公共文化服务“展示政治”的效果

任何展示都面临着展示出理想的效果,以及差强人意或者事与愿违等多种可能性结果。比如,一位才艺展示的待聘人员,尽管他(她)经过了一番准备和包装,尽量把自己预先设定的形象和气质以最优秀的(至少是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展示给评委。然而,展示的结果还是面临被认可以及被拒绝的可能。“展示政治”也不例外,尽管展示主体把自己主观的特定理念、目的或形象,以突出的方式展示给受众,然而这种“展示政治”中的“编码”信息在传达到受众时,受众并不会产生诸如数学模型中“1+1”必然等于2的直接反应,相反,受众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以及知识背景进行能动性“解码”。

这种“展示政治”中“编码”到“解码”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了展示中主体“输入”的价值和理

念并不一定会按照预期那样产生特定的“输出”。例如当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在中央层面看来就并未完全展示出其政治意图。《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各地纷纷拔地而起,宽阔的场地、一流的设施、标志性的外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景观,然而走进一些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文化馆,感触最深的就是缺少人气和吸引力……远远不能吸引当地的老百姓。”^[23]简言之,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设施建好了,也免费开放了,但是“可及性”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服务对象的民众之间的“适合度”,即服务的距离、时间、内容和方式是否便于服务对象享受服务。恰恰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变成了“难可及”或者“不可及”,才导致很多公共文化场馆表面高大上,而由于在实际服务中的不接地气而门庭冷落甚至门可罗雀。^[24]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十多年来的建设效果,有学者甚至给出了“文化体制空转”的基本判断。认为现行的文化体制运行效率低,虽然表面上表现出体制运转的充分和繁忙,然而并没有产出令群众满意的实际效果,从而陷入了一个内卷化的体制之中。^[25]因此,尽管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树立“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但如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结果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上,而不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的话,那么展示政治“输入”的初衷必将被不断消解和解构。

这同时也提醒人们,展示政治是一个双向互

表1 信息宣传工作评分制度相关档次及分值

相关报道	得分
被《新华社内参》、《人民日报内参》、《求是》等采纳并刊发,在中央级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50
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中央级主流媒体采纳并刊发	40
被文化部《文化要情》、省级媒体采纳并刊发	30
被文化部《文化信息》、创建示范区(项目)同级媒体采纳并刊发	20
被文化部网站、国家公共文化网、示范区(项目)人民政府网站采纳并刊发	10



动的行为,尽管本文更主要的是从政治展示者角度进行论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展示的受众是被动消极的,他们会结合自身的处境对展示进行能动性解读,甚至形成他们自身的“隐藏文本”。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展示的意涵往往会扭曲、变异甚至弄巧成拙,背离其初衷。

四、作为新的分析视角的“展示政治”

任何展示政治都是有目的性的、有选择性的,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可以认为,这种展示中的“被看见”现象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与权力/知识诱导人们去看的——它取决于人们“被规定去看”这一点^[26]。

任何政治都离不开戏剧性的表演。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表演的前台是公开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希望自己的表演符合公众的期望,也是演员自己试图让观众接受的形象。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为在他人心中塑造一个自己所希望的印象而表演。^[27]“展示政治”就是展示主体借助建筑、文本和活动等各种展示载体来设定特定的“剧场”,然后主动展示出自己希望别人接受的印象或理念,争取受众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和回应的政治策略。

面对不同的“剧场”(社会情境)，“展示政治”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可以说，“展示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和治理艺术或策略,然而它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分化出不同的具体策略。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展示出“特定的”政治理念或形象,然而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展示主体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展示策略。

“展示政治”需要文化的包装,是文化政治的一个重要形式。弗兰科·莫尔梯认为:“社会秩序仅是‘合法的’还不够,它还必须在象征的意义上

是‘合理的’……一个人必须把社会的标注理解为自己的标准,他必须内化社会标准,把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冲动融为新的单元,直至前者 and 后者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这种融合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赞同’或‘合理性’。”^[28]

“展示政治”源于政治中“展示”要素的发现,这正如“身体政治”源于身体理论发现,“身份政治”源于身份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一样。政治生活中展示的广泛运用和渗透,使得“展示政治”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析视角。它不仅仅存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分析之中,还可以应用到其他政治领域的分析研究之中。笔者对展示政治的提出,也是从展示的视角对政治尝试进行新的理解和解释。展示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方式,是一种具有主观思想目的的表达方式,是对信息有选择性取舍之下的展现方式。展示的这种弹性和灵活性,很容易与政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结合起来,使得展示政治广泛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从而为展示政治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潜力。

注释:

[1](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03页。

[2][27](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3] 本文以公共文化服务为案例,源于作者目前主要研究公共文化服务,掌握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正如笔者所强调的,展示政治遍布于一切公共行为和公共政策之中;而且,对于笔者而言,展示政治纯粹是一个客观的中性词,丝毫没有任何贬义意涵。

[4] 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

- 科学》2006年第3期。
- [5] 张怡《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外国文学》，2000年第4期。
- [6] 仰海峰《表象体系、主体幻觉与意识形态国家的职能——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探析》《理论探讨》2010年第1期。
- [7]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2、98页。
- [8] [26] (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1页。
- [9] Sharon Macdonald. Exhibitions of power and powers of exhib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A]. in :Sharon Macdonald. The Politics of Display: museums, science, culture [C].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10.1~17.
- [10] 王志弘《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http://www.docin.com/p-6915319.html>。
- [11] (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6页。
- [12] (英)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3~93页。
- [13] 廖为建《政府公共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
- [14] 李少惠《转型期中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研究》《学术论坛》2013年第1期。
- [15] 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 [16] 《2013年度湖北省地市级三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http://www.hbwh.gov.cn/gk/tjsj/4750.htm>。
- [17] 王其钧《城市景观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18] 英明、罗忆《视觉符号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当代传播》2007年第6期。
- [19] (英)比尔·希利尔《空间是机器——建筑组织结构理论(原著第3版)》，杨滔、张信、王晓京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 [20] (英)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 [21] 龙小农《从形象到认同——社会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 [22] 《关于开展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宣传工作的函》http://www.ndcnc.gov.cn/shifanqu/gonggao/201303/t20130327_606991.htm。
- [23]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提高效能》，《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9日第17版。
- [24] 吴理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4日第7版。
- [25] 王列生《警惕文化体制空转与工具去功能化》《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5期。
- [28] Franco Moretti (1987),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M], New Edition. London: Verso, pp.16.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编号:10ZD&018)、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CNU14Z02008)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李世敏，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9；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
- (责任编辑 杨瑜娴)